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主要行为体策略选择

叶海林

【内容提要】虽然印度洋地区在全球格局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印度洋区域仍然是全球格局演变过程的因变量，不宜过度夸大印度洋区域的全球战略重要性。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旧有的问题益发突出，区域内外行为体的策略对照日渐明显，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呈激化状态。中国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的域外行为体之一，对印度洋的经略遭受更大考验。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的变化主要源自于域外大国策略的碰撞，中国作为关键域外大国，如何回应印度的挑战是衡量中国印度洋策略实施效果的关键标准。

【关 键 词】印度洋　中美关系　印度　“印太战略”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问题与中印关系，电子邮箱：yehl@ cass. org. cn

【DOI 编码】10. 16717 / j. cnki. 53 – 1227 / f. 2021. 05. 001.

近年来，印度洋区域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印太战略”持续推进、中国和印度边界争议冲突激化、国际社会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焦虑增加、南亚区域行为体之间对抗行为加剧。全球议题向印度洋区域的投射现象增多，区域安全热点问题频发，这一区域受到越来越高的国际关注。高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印证了罗伯特·卡普兰的预言，印度洋地区将成为“21 世纪世界权力的中心”。①

不过，需要认识到，“21 世纪世界权力中心”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述，意思既可能是指能够决定全球事务的强权集中分布的地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伦敦—巴黎—柏林三角；也可能是全球强权战略对撞的竞技场，如同一时期的

①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March / April 2009, Vol. 88, No. 2, pp. 16 – 29.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巴尔干。那么，印度洋区域到底是已经或即将成长为足以影响全球格局的一个力量极，还是将沦为诸大国竞争角力的舞台呢？如果印度洋地区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是否意味着本地区的强权将因之登上世界权力之巅呢？当今国际格局下，印度洋地区到底是更大范围的印太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一个单独的战略区域？很大程度上，战略研究界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印度洋地区格局及其走势的研究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①

本文试图立足于2020年以来的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变化，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对印度洋区域的安全格局进行分析，以展望未来走向并分析印度洋安全格局与中国的关联。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就中国经略印度洋提出若干对策性思考，为印度洋安全态势及走向的多角度讨论略尽微薄之力。

一、兵形与地势：全球视野下印度洋安全格局及态势的认识

不论是在西方列强扩张的殖民主义时期，还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印度洋区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不断被人们谈论，然而令“印度洋全球枢纽论”的支持者略感尴尬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洋区域从未出现过足以影响全球秩序走向的世界级强国，雄踞其他区域的诸强国也从未将印度洋作为性命攸关的争霸主战场。在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之中，印度洋区域始终是大国博弈格局的一个从属地区，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剧烈的国际体系转换过程中，印度洋区域所发生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无关大局和边缘性的。归根结底，一战是在西欧决出胜负的，而雅尔塔体系则是由东欧以及亚太一系列决定性战役奠定的

① 此类研究参见：朱翠萍《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战略新动向：驱动因素与局限性》，《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8页；李恪坤、楼春豪《印度洋安全治理：现状、挑战与发展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第85－106页；时宏远《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5－123页；肖军《从印太战略报告透析美国的印度洋战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4期，第78－91页；冯传禄《“海上丝路”视野下的印度洋地区地缘环境与地缘风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2期，第16－51页；李家胜《印度洋相遇—印度应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行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37－61页；刘思伟、杨文武《印度洋议题的安全化与中印两国的参与》，《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75－94页；宋德星、孔刚《欧盟的印度洋安全战略与实践—以“阿塔兰特”行动为例》，《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5页；朱翠萍《印度洋安全局势与中印面临的“合作困境”》，《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3页；李源《浅析当前西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概况》，《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28－46页；张文木《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麦金德“中枢地区”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和制海权理论的新思考》，《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2期，第4－40页；赵干城《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再定义的动因》，《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第24－35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基础。印度洋地区从来没有决定过人类命运的走向。具体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维也纳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欧洲霸权的归属以及表现形式，印度洋在围绕欧洲霸权展开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维也纳体系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换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欧洲能否成功解决德国崛起造成的结构性冲击，德国不是在印度洋崛起的，也不是在印度洋失败的。短命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身就是为了要解决最终导致维也纳体系瓦解的德国问题，也和印度洋无关。到了雅尔塔体系的冷战阶段，美苏争霸的焦点仍然在欧洲，差别只在于欧洲国家本身不再具备参与大战略博弈的资格。

虽然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印度洋一直是全球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数百年来沿着这条航道漂洋过海的无数三桅船、蒸汽船、集装箱滚装船、大型油轮不断为印度洋枢纽论提供最直观的证据。然而，印度洋区域是不是左右国际格局甚至影响国际秩序的战略枢纽，通过了多少船只从来不是关键。这一问题必须置于具体的战略演化过程中加以考量。总结以往的国际体系演变历程不难发现，印度洋地区在每一次结构性变革与重组过程中都没有成为战略枢纽，没有对格局的演变、体系的重组产生过决定性作用。数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见证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强国在印度洋实现全球崛起，也没有一个强国的争霸梦在印度洋折戟沉沙。既然如此，所谓印度洋的“全球枢纽”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印度洋地区被臆想出的关键地位和现实中的边缘性质之间的反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战略枢纽的误解。关于战略，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总结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包含“庙算、将略、兵形、地势”① 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至今仍然能够给人们以启发，尤其是在理解战略枢纽的时空内涵方面。所谓“庙算”指的是国家的大战略构想，“将略”则是落实大战略构想的具体方案，“兵形”在军事上指的是作战样式，在国际关系语境中则意为对战略及其具体方案的执行，“地势”则是遂行战略、展开行动的环境依托。“庙算”和“将略”是战略设计层面，“兵形”和“地势”则是战略执行层面。战略谋划再优秀，如果执行层面没有效果，只能被评价为失败的战略。而决定战略谋划效果的不是次要方向上的战略执行，只能是决定性方向上决定性阶段的战略执行效果，即战略枢纽上的执行效果。战略枢纽指的是影响战略全局的决定性阶段或者决定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九)，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性地点，作为空间概念，涉及“地势”并受到“兵形”的影响，而“兵形”则与技术水平、格局状态等可变、易变参数密切相关。作为时间概念，涉及的则是“兵形”，“兵形”不可能脱离“地势”即自然地理环境要素而孤立存在，但又不是单纯被动地受制于“地势”。只有将战略枢纽在“兵形”与“地势”两方面的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更具战略意义的“庙算”和“将略”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思考。在大战略的运行过程中，“地势”的静态价值无法代替“兵形”的变化作用，难以对“庙算”和“将略”产生决定性影响。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作用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海上运输需求，印度洋海上通道就会始终存在，并且会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理论的角度，的确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印度洋区域外的世界强国将印度洋区域作为维护自身霸主地位或者扼杀对方霸主梦想的决定性战场。也就是说，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性来自于这一区域所蕴含的禀赋，如海上通道、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甚至市场等人们能够设想的任何一种战略资源。一定程度上，这种论断与李德·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主张的迂回战略存在着共通之处，主张不通过直接“摧毁”对方构建的区域秩序来粉碎对方的霸权梦想，而是通过控制对方崛起所依托的战略资源来“规锁”对方的发展进程。不过，正如李德·哈特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①。如果国际格局的主导国家能够用剥夺崛起国获取某一区域的战略资源的方式来遏制崛起国，那么霸主国在崛起国所在区域就近对后者进行封锁或阻隔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采取消灭终端的直接战略显然好过采取阻隔战略资源获得的间接战略；另一方面，如果崛起国能够在远离自身核心区域的地方击破霸主国的封锁，那么崛起国早就应该具备在核心区域驱逐霸主国的能力，劳师袭远在任何战略理论中都是不受推荐的。因此，阻遏崛起国获得某种战略资源，并不能以较小的资源来阻止对方的崛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对方的发展进程、迟滞对方的壮大速度，而且最终引发的后果往往不是对手的自认失败，而是迫使对方在情形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以武力打破既有霸权体系的封锁和遏制。这样的案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多次被人们所目睹。

换句话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博弈策略，间接路线不是霸主国实现战

① 有关论述参见：［英］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略目标的途径，只是在真正而彻底的战略对决出现之前实施的旨在扩大本方优势的手段。间接路线要么无效，要么有效到被遏制对象无法忍受从而选择对决，最终的结果仍然是直接路线。军事上的迂回和大战略上的迂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人们从军事战略视角思考大战略时常常陷入的思维误区之一。

就此而言，印度洋区域是无法凭借海上通道的战略重要性成为全球枢纽甚至成为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的“世界中心”的。印度洋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唯一的可能性是在区域内产生足以改变全球战略基本态势、重塑国际格局甚至重组国际体系的强权，区域外强国与区域内强权之间的博弈关系随之成为国际格局演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使这一区域转化为国际舞台的权力中心。这一前景能否出现，是区域外强国在思考涉印度洋战略而进行“庙算”时真正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将“地势”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的山川陆海引申为国际格局，也就是大国博弈的战略棋局，更有助于人们辩证地看待“兵形”与“地势”的关系。这一引申更加强调具有一定能动性质的“势”而不是静态或者基本静态的“地”。如果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世界级强权，那么全球格局都将因此而发生改变，也就是国际体系的“地势”发生了变化，其他强国都将不得不针对新强权的出现在“庙算”和“将略”上进行调整，从而影响“兵形”。这应该是对“兵形”和“地势”辩证关系更加全面的理解方式。

印度洋地区是否已经、将要或者能够出现影响世界的强权？这是从全球格局视野下考察印度洋区域态势变化的核心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必须承认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局势在国际格局演变视角下是从属性问题，属于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所有关于印度洋安全态势的讨论也就因此需要被置于更广大的视角下，局限在印度洋区域内讨论区域各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固然仍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无论如何不能被置于真正影响未来全球格局走势的区域内大国博弈关系之上。毫无疑问地，在当前的印度洋区域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世界强权。唯一在幅员和经济规模上具有可能性的国家就是印度。关于印度的崛起前景，多年来国际学术界与政策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无意于在已经汗牛充栋的成果中再增添新的文献，但任何讨论都需要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回顾过去的数年，特别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2020 年，印度到底是更加接近还是更加远离自己的梦想了呢？

一个让印度的鼓吹者非常尴尬的事实是，2020 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印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度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经济规模缩水达到 7 个百分点，人均 GDP 跌回到 2000 美元以下。这种表现很难让那些认为印度即将登上历史高点的分析家感到振奋，不仅仅是因为数字实在过于糟糕，更是因为一场疫情暴露出了印度社会管理、经济质量、政府效能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印度的社会体系距离开展现代化建设所必须达到的水准依然非常遥远，而一个前现代社会，无论阶段性经济增长多么抢眼，都无法得出这个社会已经驶入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不完成社会管理上的现代化，购买再多的武器装备、引进再多的外来资本，都无法避免这个国家的华丽外衣被一场病毒剥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印度本轮的经济减速并不始于新冠疫情，近几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一度光华夺目的内外表现已经开始呈现颓势。面对经济发展减速、社会问题频出的困境，莫迪政府的注意力毫无意外地逐步由提振国内经济、完成弯道超车转向对内强化印度教民族认同、对外炫耀武力以谋求国际地位。这种政策着力点的改变不是因为印度的综合国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支撑其大国梦想，而是因为印度人民党需要用各种各样看上去闪闪发光的政治成就来继续维持其执政合法性，哪怕为此需要过度消耗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莫迪急于寻求大国形象的激进行为犹如抱薪救火，虽然看上去强横无比，不仅加剧中印边界冲突、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状态，而且不断提升远海行动的频率。但是，所有类似行为都无法避免印度陷入后继乏力的尴尬局面，轻则水过地皮、无果而终，重则麻烦缠身、难以自拔。2020 年过后，印度的崛起之路至少是变得更加曲折了。综合而言，印度洋的地势与兵形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从全球格局下判断印度洋安全态势能够得出的基本结论。

观察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态势变化，不难发现，虽然印度洋地区在全球格局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印度洋区域仍然是全球格局演变过程的因变量，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能力远远弱于国际格局对区域态势的影响能力，因而不宜过度夸大印度洋区域的全球战略重要性。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对印度洋安全态势的具体表征略作叙述，以便为从技术层面讨论印度洋各行为体的策略选择提供基础。

首先，印度洋区域安全结构脆弱，区域强国主导地区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存在明显短板。印度洋区域长期以来缺乏主导性力量，印度虽然是本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建立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以提供安全产品和维护地区秩序。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基本格局体现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抗。冷战结束后，印巴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明显，巴基斯坦已经无法制衡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一家独大地位。即便如此，印度距离成为印度洋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依然非常遥远，美国奉送给印度的“净安全提供者”地位名不副实，印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安全秩序的净享受者。虽然印度作为本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不断巩固，与其他区域内成员的差距日渐悬殊，但印度洋区域并没有建立起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秩序，区域外成员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区域内成员也往往在面临安全问题时更多思考域外因素的关联，印度的影响力特别是制度化约束能力仍然主要是新德里的雄心而不是印度洋的客观现实。

其次，印度洋地区议题的对外关联性增强，但区域外国家干预印度洋事务的决心仍然不足。印度洋区域曾经长期作为全球体系的例外部分存在。近年来，虽然地区部分国家实力的提高以及地区合作进程的加深，使得印度洋区域与国际体系的连接不断增强，区域外大国对区域内重要成员的期待逐步提高，但一则这种外部关联尚没有使本地区成为全球大博弈的核心区域，域外强国在制定涉印度洋策略时仍然将之看成是各自全球战略的附加部分。的确，区域外大国对这一地区内热点问题和战略态势走向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区域外大国之间以及区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利益碰撞、战略折冲和策略博弈也在不断加剧，但谁都不愿意公开介入印度洋区域的安全问题，比如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域外强国都认为介入克什米尔问题的收益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成本却可能高到难以承受。

最后，印度洋地区安全矛盾依然突出，地区解决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阿富汗问题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但美国仍然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其影响因素不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而在美国国会山的案牍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阿富汗问题并没有特别关键的全球战略价值。美国人更多是从国内党争的角度看待阿富汗战争，而不是从国际博弈的视角出发。至于其他区域内外利益相关方，阿富汗问题到底是一个影响本地区态势的安全议题还是一个影响他们与美国关系的外交议题，始终存在着不同但均有说服力的理解方式。但无论如何，没有人相信印度洋区域安全架构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阿富汗问题。至于现存的印度洋区域合作与协调机制，即使在印度洋区域范围内，也可谓毫无存在感。印度洋地区一体化进程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沿岸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仍属于不同的板块，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关联远远小于与域外的联系。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二、“黑天鹅”之下：新冠疫情对印度洋区域态势影响及美印等主要行为体因应

相对于状态比较稳定且有延续性的结构层面，行为体层面的动态性质要更加突出，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在坚持战略和宏观视野的同时，需要侧重对行为体的具体策略及政策实践进行跟踪研究，但同时还要避免对行为体释放的信号做过度解读，将战术行为理解为战略行动的风险。观察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印度洋安全态势相关行为体的策略，需要在全面认识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前提性问题是确定新冠疫情对印度洋地缘结构的影响，以此作为考察疫情暴发以来有关各方行为表现及其目标与诉求的出发点。

新冠疫情是2020年全球影响最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甚至有诸多分析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将从此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已经成为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格局调整的分水岭。这种说法虽然还面临诸多争论和挑战，但疫情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印度洋区域内都是如此。

首先，本就脆弱的印度洋地区的综合安全结构有效性明显下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不论是区域有效国家还是区域外强国，都没有表现出为印度洋地区提供公共卫生安全产品的决心和能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首届首脑视频会上虽然讨论了四国加强疫苗合作并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一则这一表态来得过晚，疫情已经肆虐了一年多，四国只是在美国执政团队变更后才想起四边机制存在公共产品合作的需求和可能性；二则四国之间的共识极度不平衡，将作为重要生产方的印度作为美国疫苗需求的保证者，丝毫不考虑向印度洋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三则印度的产能很快就被证明并不可靠，印度国内疫情的突变使得印度在四国峰会之后不久就宣布暂时停止疫苗出口，给了断言四国机制将成为印太新秩序的基础架构的人们沉重一击。

印度洋地区公共产品困境的主要成因是当前国际格局的主导国家美国和本区域的优势国家印度对外政策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明显的利己主义。美国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和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迅速蜕变成一味鼓吹“美国优先”的霸凌者和规则破坏者。一方面，这种变化固然证明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后自诩的“文明灯塔”形象的虚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伪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产业空心化日渐严重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保障自己创造的国际规则继续维持下去，哪怕这套规则本来就是非中性的，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所作所为再明显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既无心也无力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更谈不上发挥自己吹嘘的所谓“领导作用”。拜登上台后，虽然反复宣称要实现“美国外交”的回归，重视盟友的价值，但四国峰会赤裸裸的疫苗利己行动证明美国的行为仍然奉特朗普时代为圭臬，即使有可能调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至于印度，其周边外交的极端利己主义是富有传统的，不论疫情期间印度政府说了多少漂亮话，人们都很难相信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会真正重视印度洋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联系到印度抗击疫情工作的实际表现，即使印度确有意愿发挥在印度洋地区首要力量的作用，人们对印度领导印度洋国家战胜疫情的前景也不应该抱有过高信心。

其次，印度洋地区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日渐提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洋沿岸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平衡美国霸凌行为的建设性力量，但相当多的国家乐于看到在印度洋优势国家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缺位的情况下，由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为包括印度洋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已经成为当然的国际抗疫主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力量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霸主的“忌恨”甚至阻挠，美国联盟体系的骨干成员和一心要与中国竞逐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强国对中国是否将利用疫情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满腹狐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更多成员，增大了对中国的需求与期待。他们认识到美国和印度都无力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公共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他们看来，率先摆脱疫情的中国理当成为自然而然的备选。

再次，影响区域格局走势的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将进入拉锯战阶段，使得体系和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美国行为的蜕变、印度对美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对外部诉求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局势以及印度洋地区局势走向。考虑到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已经确定，中国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如何回应外部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矛盾心理，对于未来全球格局的走向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中国整体意义上的物质力量仍与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但率先结束新冠疫情的中国相对于美国更早也更多地获得了进行自身调试以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推动经济复苏的机会，从而有可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能进一步缩小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已经和美国的极限施压策略进行了长期周旋，并没有像美国所幻想的那样被轻易打垮。后疫情时代，中国以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为后盾，通过积极有效的对外战略实施，对冲美国的全面施压，实现美国压力下的逆势上扬是完全可能的。这也符合人们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周边环境可能长期生变，但变化中蕴藏着宝贵机会的辨证判断。而印度在疫情之后经济陷入巨大困境，其泥足巨人的本质进一步显化。尽管如此，印度的地缘政治雄心并未受挫。恰恰相反，面临国内严峻的抗疫形势和艰难的经济状况，印度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以强有力甚至略显过度的强硬姿态弥补自身实力不足，以期给想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造成更大压力的心态非常明显。这种激进的策略不但使得印度与其想定对手的关系充满风险，也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变得更加脆弱。具体到印度洋地区的主要行为体层面，2020 年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操之年，10 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四国安全对话”(Quad) 。事后，这次会谈被形容为一场由美国主导、日本承办、澳大利亚帮腔、重点拉拢印度的政治“表演”。11 月“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第二阶段在孟加拉湾展开，澳大利亚时隔 13 年重返“马拉巴尔”军演，美日印澳四国海上力量也因此凑齐。在这之后，美国海军部长又多次鼓吹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区域重建第一舰队，与第七舰队共同组成印太地区的核心战力。进入 2021 年，拜登上台后，四国又召开了首次首脑视频会议，进一步协调了政策立场。

作为影响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的首要区域外力量，美国的印度洋政策保持了连贯性并有所强化。实际上，特朗普时代的政策，推动“印太战略”几乎是拜登唯一全面继承的。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性质上发生重大变化，双边关系的矛盾性、对抗性迅速上升。这种变化既可以从美国作为当前国际格局的主导性力量与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成长大国的中国之间的国际规则与话语之争中感受到，也体现在中美两国直接博弈和对抗的全球海上战略态势的变动之上。中国海军尽管仍然主要在亚太周边地区活动，然而美国的预防性遏制举措早已遍及全球各个黄金水道，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巨大溢出效应，对中美战略利益存在交汇的诸多地缘区域及次区域构成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印度洋地区。

数年前，特朗普对“印太战略”再包装并高调推出，极大提高了印太概念的话语力度。《印太战略报告》推出前后，美国与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潜在盟友印度进行了多轮互动，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形成了一定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声势。没有特朗普政府的高调宣示，“印太”仍然只会是日本和印度少数政要和学者创造出来的“自我安慰”概念。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面对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表现全面优于美国的中国，美国的战略焦虑达到了空前地步，对华策略从充满特朗普风格的以战略压力讹诈经济利益的外交路线，迅速向传统的霸主国遏制战略回归。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中蕴含的战略焦虑，差别只在于拜登更加强调发挥盟友的作用，特别是核心盟友的作用。

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特朗普版的印太概念已经演化成为一套针对中国的遏制与对抗战略。第一，印太概念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就是要从地缘战略上对中国进行弧形遏制，战略动机非常明确。这一指向在全球战略层面看，就是要落实两洋联动的印太概念；第二，印太概念在手段上越来越以构建军事联盟对华进行协同威慑为主。特朗普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愿意通过直接作用于双边关系的讹诈手段逼迫战略对手做出妥协，对于需要承担成本的区域多边安排缺乏兴趣。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和美国上下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仇华情绪，在军事上推动印太联盟就不会如此急迫。新冠疫情后，美国军事上对抗中国的势头迅速加强，拜登时代的政策倾向将继续强化，这一点可以从横跨印度洋到南海的多场军事演习和武力威慑行动中表现出来；第三，印太概念的框架结构已经确定，以美国为首，日澳印为辅。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核心盟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是对印太概念表态最为积极、行动最为迅速的一个，积极冲在围堵中国的第一线。

疫情暴发后，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激化之后，印度拥抱“印太战略”的动作也在逐渐强化。面对“印太战略”的拉拢，印度的心态逐渐从半推半就向积极回应倾斜，更加沉迷于中国会受制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声势而向印度做出妥协的幻想，借助印太概念加大参与国际价值链重塑，获取实际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在不断增强。虽然学术界一度普遍认为，印度具有悠久的外交不结盟传统，但实际上印度外交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动作同样频频①。几乎与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同步甚至在时间线上更加提前，印度就确定了对华“问题”外

① 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1 期，第 5 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交策略。[①] 2017 年年中印度制造了洞朗事件，中方争取事件和平解决的善意努力被印度误判为中方无意在中美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对印挑衅行为采取报复乃至惩戒行动，印度可以利用中方不寻求对抗的心理，对华采取更大规模的讹诈行动。因此，洞朗事件发生后，印度一边积极响应中方的呼吁，促成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另一边则在实控线加大渗透蚕食力度，不断升级越线挑衅的动作，并在 2020 年年中酿成了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导致双方出现人员死亡，并悍然违反中印双方协定而在实控线鸣枪，气焰日渐嚣张。2020 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既是双方边界问题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也是印度趁有利态势谋求不当利益的心态驱使使然，与中美关系的状态具有不可割裂的联动关系。

印度对华政策在 2020 年更加消极，是在印度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出现的。分析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时，不能简单将之归因为美国的挑唆以及印度试图向美国缴纳“投名状”。实际上，印度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很多战术动作的选择甚至要早于美国；也不能将之单纯理解为印度受到国内经济下行、疫情恶化压力的“转移视线”手段，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是民粹主义的机会主义表达，而是印度人民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观。日渐膨胀的大印度意识和印度国内阶段性的经济社会形势并没有直接关系。归根结底，印度对外政策的强硬化是由于印度对当前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存在的两个基本判断使然，一是印度正在快速崛起，而且崛起之路不可阻挡；二是印度崛起恰逢有利的国际环境，除中国以外，其他世界大国都乐于看到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明显提升。尽管这两个判断都带有一定的水分，然而印度对此笃信不疑且不可说服，以至于其对外战略的强硬化也不可改变。印度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问题等方面对华加大施压力度，特别是限制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方面，印度扮演了美国马前卒的角色，率先对数百个源自中国的移动应用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限制，美方随后跟进的类似举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种无底线的连续挑衅行动，正是源自于印度的两个基本判断。某种程度上，中国拉住稳住印度的策略没有奏效，甚至对印政策陷入越想拉住却越疏远、越想稳住却越动荡的怪圈，也是因为印度这两个判断的存在。

---

① 参见：叶海林 《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当代亚太》2017 年第 6 期，第 24 – 47 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三、印度：中国应对印度洋方向战略挑战的“戈迪安之结”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历来认为，指导战争者，最要紧的是观照好战争的全局。这一原则在军事斗争和大战略上都是有用的，其底蕴在于哲学上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局部总是整体的局部，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坚持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忽略的一条重要法则。对于快速成长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行为体且正深度参与国际秩序演化过程的中国来说，这一法则尤其重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延续了十六大以来的外交关系分类法，将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划分为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三大类，并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思想。这种将整体解构为局部，由局部组合成整体的辩证思维，意味着中国既要从宏观全局角度妥善处理三大类外交伙伴工作方略的相互支撑和促进问题，也要从微观角度认真落实处理与每一类外交伙伴的关系问题时需要遵循的原则。而印度洋区域则是汇聚了中国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实践的集中地域，对于校验中国外交理念的有效性和国际接受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指标性作用。

一方面，中美博弈的外溢效应已经延及印度洋区域，成为影响印度洋安全态势的重要因素。中国多年来在印度洋区域的持续经济投入既使得中国能够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发挥独特作用，也导致印度洋成为中国至关重要的海外利益攸关区域。美国则一方面固守传统的霸权主义海权观，试图保持对包括控制印度洋若干水道在内的全球制海权，另一方面将印度洋作为狙击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重要战场。双方在印度洋的碰撞尽管并非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但美国对华打压的全面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区域性反应。美国在战略上依托印太概念编织遏华联盟的举动和在经济上加紧对华切割，试图劫夺中方在海外正当投资并阻挠中方与其他经济伙伴的正常合作。这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让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某些国家断定中国在国际环境复杂化情况下，只能专注于抵抗美国的战略压力，他们可以趁机向中国提出超过其原本议价能力的要求，迫使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或者发生多点冲突而息事宁人，对这些不当要求做出妥协。在怀有这类幻想的国家当中，印度是心态非常典型的一个，也是动作最明显、野心最大的一个。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作为中国周边重要邻国，印度对华消极甚至对抗心态的孳生及膨胀，虽然无法产生类似美国对华恶意行为那样的危害效果，但一则作为中国西南战略方向上的主要行为体，印度对华政策能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二则作为较早跳出来配合美国的中国周边邻国，印度对华消极心态和恶意行为能够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如果中方处理不当，将有可能导致周边地区及更广大范围出现对华漫天要价的连锁反应，使中国周边和国际环境更加困难。因此，在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外部环境复杂化的情况下，如何管控并经略好中印关系，不仅涉及到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稳定与安全，也影响到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的全局态势。就此而言，将中印关系确定为中国经略印度洋的核心命题和策略效果的标杆，并不为过。

从中国全球战略角度审视中印关系，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实力相对印度明显占优，但印度的国际与地区环境较中国有利，双方各有优势。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中国也不是印度崛起道路上的关键助力，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可塑性。对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中印两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的诉求，中印合作缺乏稳定且可持续的战略共识。针对未来中长期印度以攻势心态为主的对华战略思维以及印度地缘优势在南亚长期存在的现实，中国应该注意防止对印外交陷入被动求稳的思维误区，避免对印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之间出现不协调，注重外交策略的虚实结合，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策略妥善处理对印工作。

当前，中国外部环境压力主要来自美西方伙同亚太地区部分势力在海上方向遏制围堵中国的企图。2020 年以来，美国拉印度参加反华制华联盟的意图愈发明显。在中国集中精力应对美国压力挑战的时候，防止包括印度洋方向在内的其他战略方向陷入不必要或者不紧迫的地缘矛盾，既符合中方国家利益，也是中方稳妥推进周边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所必须。但是，在印度洋方向求稳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对印工作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影响中国的周边战略效果。

首先，要避免陷入中印存在共同利益因而存在广泛合作基础的误区。印度和中国虽然同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金砖”机制成员，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印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层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以及因共同利益而奠定的合作基础。实际上，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方式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印两国在国际秩序演变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印度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规则框架下实现“体制内”的崛起，而中国已经是美国体制所要隔离、排斥乃至打击的挑战者。在印度超越中国之前，印度是不会把与中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国合作作为对外战略的优先选项，而美国也不会把防范印度崛起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印美合作远比中印合作存在更广泛的基础和更明确的对外目标。在全球事务中，中印主要是竞争关系，围绕着大国地位与国际话语权、区域秩序和南亚主导权，中印关系以矛盾和竞争为主，协调与合作居于次要地位。不仅如此，中印双边关系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还会既约束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也会不可避免地给第三方试图利用中印矛盾甚至挑唆中印制造冲突的机会。就此而言，未来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管控分歧并防止冲突，而不应该也没有办法以深化战略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为主。

其次，要避免陷入中国需要和美国争夺印度，避免美印建立安全联盟的误区。当前，美国有强烈动机将印度纳入遏制中国的战略轨道，一旦美印双方达成战略共识，也的确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战略压力，甚至导致中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以争取印度不倒向美国，特别是以单方面释放善意的方式来争取印度作为对印工作的主要手段。中国既要认识到相对于美国，中国和印度的矛盾更深，印度对中国的零和诉求更多，也就意味着中国满足印度要求的门槛更高、条件更苛刻；也要看到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争取印度的努力，很容易被印度理解为是中国苦于美国战略压力的不得已之举。印度因此会更相信自己在中美之间待价而沽是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甚至有可能相信进一步表现出对美国拉拢的热忱会引发中国的焦虑情绪从而获得更大回报，这将使中国争取印度的成本更加高昂，最终导致中国支付了原本不愿意支付的巨大成本，却没有换得印度给中国的善意回报。还需要看到，即使中国不去争取印度，美国拉拢印度的企图也不是注定能成功的。印度外交有着悠久的独立自主传统，而且印度深信越是在世界大国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维持战略独立就越能从两边获得好处。自威廉·克林顿以来，美国就一直在拉拢印度，而印度的回馈从来都谈不上积极主动，原因就在于印度既不愿意把自己过早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陷入为美国火中取栗的风险，也不希望过早加入美国的阵营而失去两边渔利的好处。此外，印度还不能不顾及传统盟友俄罗斯的感受以及国内日渐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毕竟，俄罗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印度的国防自主能力，而印度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不断上升，也不会赞同印度政府对美国过于殷勤。

再次，要避免中国一旦和印度产生冲突就会陷入成本高风险大的两线对抗的误区。一则印度自身和中国相比，实力差距仍然在至少四倍以上，中国不愿意挑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战美国，印度又怎么会愿意挑战中国呢？印度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主观认为中国没有和印度对抗的意愿，而不是印度自信可以在实际冲突中取得对中国的优势甚至胜利；二则中国不愿意两线对抗，印度却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两线作战的阴影之下。尽管巴基斯坦实力衰落明显，然而2019年2月的印巴空中对抗表明，印度并没有能力将对巴的实力优势转换为现实的战场优势。只要中国继续支持巴基斯坦，鼓励巴基斯坦的信心，印度就不可能认为自己已经解除了巴基斯坦方向的威胁，两线对抗的风险就会始终悬挂在印度头顶，从而对印度的冒险政策作出约束；三则面对印度乘有利环境寻求超过其自身实力的对华优势的企图，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到底是争取、安抚甚至绥靖印度的成本高，还是通过有限的对抗性行动降低印度的冒险主义心态、防止印度继续蚕食中方领土和周边利益、稳定“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南亚地缘结构维持均势的成本更高？至于说所谓印度也是核武国家，中国面对一个核武国家应该态度谨慎的说法，这是非常缺乏战略常识的，中国也是核武国家。同理，为什么印度却不需要保持谨慎？而且，印巴两国连年在克什米尔控制线附近爆发低烈度战争，为什么没有国家担心印巴冲突会引发核大战？实际上，核武国家会因为微小的边界冲突而最终走向核大战的假设本来就是不成立的，核武国家因为核武威慑而防止有限冲突转化为大规模战争的案例却并不罕见。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印巴卡吉尔冲突等案例与其说证实了核武时代全球和平的脆弱性，还不如说检验了核武对防止国家间冲突从小规模冲突转向大规模战争的有效威慑能力。这种威慑实际上给了核武国家对有限冲突更强的承受能力而不是相反。

以上三个误区的思维根源具有较强的共性，都是源自于中国自身实力优势和耐受能力的不自信，也是源自于对对手勇气与决心的过高估计，只考虑自己的弱点，不考虑对手的难处，在战略上固然实现了谨慎和冷静，却有可能因战略犹豫甚至战略迟疑导致无所作为，从而支付更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认识到，面对挑战甚至挑衅，在战略上采取保守策略，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将来在更有利的态势下进行反制乃至反击，以赢得优势和胜利。阶段性的战略忍耐，在任何情况下既不能以削弱将来反制的能力为代价，更不能以忍耐策略导致战略态势更加不利为代价。换言之，当前维护中印关系和中国在印度洋方向战略态势的稳定，不仅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更是为了强有力地推进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扩展，而不能是为了求一时之安全。要特别防止中国对印政策和中国的印度洋策略出现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策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略的倒置，特别是避免阶段性策略所要营造的外部环境被异化为长期目标本身。如果中国在安抚印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中国在满足印度的要求方面做得过多，不但会使中国在中印双边关系范畴内陷入印度不断要价、中国不断妥协的怪圈，也会使得印度洋地缘态势更加失衡，印度的独霸心理更强，而其他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南亚次大陆中小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自身前途忧虑更深，更加不敢反抗印度的霸凌，还会导致在美国看来，印度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因而更愿意拉拢印度，给印度提供更多实惠，使得印度挑衅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排斥中国的企图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态势，中国应适度调整对印政策和印度洋战略，除在战术层面敢于对印度的非分之想说不以外，在战略上应追求更加务实、理性的目标，建立更加符合大国战略逻辑的互动模式以及更加清晰的策略效果评估标准。对印外交应虚实结合，重点加强务实外交。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印策略应以维护印度洋方向稳定为基本目标，这一点不应改变。但维护稳定，侧重点应该放在印度具体的行为上，而不是印度对华的话语宣示上。中印关系是否稳定、印度对华政策是否理性，衡量标准应该是印度在涉华敏感议题上是否考虑中国的感受，而不是在评价印中关系时使用了多少积极的宏观概念。多年来，印度已经形成了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挤压中国立场，但在宏观表述上反复强调支持印中合作的“问题外交”策略。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是印度重复一百遍对印中合作的重视和支持，还是印军在中印实控线的一次越境挑衅更能说明印度的真实意图？中国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态度。中国对印外交，应该更加注重印度在具体事务上的表达和行动，而不是宣示层面的口头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度不妨从世界大国的高姿态多强调支持中印合作，多释放善意信号，但在具体事务上加强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意识，看重印方的实际回馈。在对印外交策略中，要注意虚实结合，对印宏观表述可虚，具体事务上要实，衡量印度态度时对其虚的宏观表达要看轻看淡，对其具体行动要看重看准，以中方的务实“问题外交”对冲印方的讹诈式“问题外交”。

更加重要的是，未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将明显增加，以往建立在避免安全成本过度增加影响经济发展的周边稳定维护策略将不得不向着眼于增大安全收益拓展安全空间的周边安全塑造策略转换。形势和目标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增强主导塑造能力，依托战略支点国家，拓展安全活动空间和手段，打造以中方主导、对中方有利的周边安全网络，以对冲美国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及其联盟体系对中方施加的战略压力。

因此，中国对印外交应该更加注重印度洋区域的整体平衡，避免印度独霸南亚和印度洋的心态进一步加强。南亚的地缘结构非常独特，印度是唯一与其他所有区域内成员接壤的国家（包括海上疆界），也是唯一的区域大国，唯吾独尊的心态从印度独立开始就始终主导着印度的区域外交思维，而且早已超越南亚次大陆范畴，成为印度对整个印度洋区域的基本立场。印度不但赤裸裸地要求区域其他国家在对外政策当中必须优先考虑印度的感受，而且还要求区域外国家必须把印度看成是本地区优先甚至唯一的外交对象。印度认为在本区域“印度第一”甚至“印度唯一”都是理所当然，不会因此给予奉行这一原则的其他国家任何外交回报。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等国而言，其印度洋政策“印度第一”或者“印度唯一”不失为节约外交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对于已经并将继续向印度洋区域投入大量外交和经济资源的中国来说，南亚次大陆乃至整个印度洋的战略平衡才真正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中国绝不能接受印度在印度洋建立排他性秩序的主张，在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更是如此。中国应该致力于维护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均衡，避免印度建立挤压区域内成员、独霸区域外大国和印度洋区域接触渠道的地区霸权，至少中国不能因为寻求一段时间的区域秩序稳定而把南亚主导权拱手让与印度。倘若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印度洋国家全部臣服在印度的地区霸权之下，中国如何在印度洋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又如何应对后院固若金汤的印度在对华方向上势必越来越大胆的挑衅行为？那时候，中国将如何期待印度能对中国释放的善意投桃报李？有鉴于此，中国在印度洋方向应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鼓励他们更加敢于维护自身的独立、安全与合法权益，增强他们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心。

（责任编辑　朱翠萍）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Main Actors' Strategy Selection

Ye Hailin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old issues of the security struc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OR)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contrast of strategies conducted by 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nd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IOR has been intensified. As one of the main extraterritorial actors of the IOR,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has been experiencing greater challen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ecurity situation through examining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actor elements that effec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this region, and discusses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This report concludes that the changes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re mainly due to the collision of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strategies. As a key power outside the region, the way how China responds India challenge is the key criteria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Key Words: Indian Ocean, Sino－U. S. Relations, India, "Indo－Pacific Strategy"

BRI in South Asia: Current Situ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Zhang Jiadong, Ke Zining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after BRI) in 2013, South Asia reg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any major projec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which improved the energy supply and transportation of countries like Pakistan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BRI in South Asia is unbalanced, with three patterns in general. The first is the Pakistan model. China and Pakistan are cooperating on all fronts, and the progress of related projects is generally smooth despite occasional fluctuations. The second is the Sri Lanka model. Sri Lanka cooperates with both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BRI can still be promoted in general, although it often faces ups and downs. The third is the India model. While India is publicly opposed to the BRI,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and have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lthough it suffered setbacks in 2020 due to the pandemic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